

让少数民族文献研究融入中国文献学

聂 鸿 音

内容摘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是隶属于中国文献学的一个分支而非独立学科。少数民族文献的研究成果可以在汉文古籍的辑佚、校勘和注释诸方面发挥作用,汉文古籍整理的原则和方法也可以成为少数民族文献研究的规范。当前的学术研究和学校教育不能脱离中华文化主流而过度强调少数民族文献的特殊性,自我封闭的研究没有前途。我国的少数民族古籍整理手段尚不成熟,如果能参照汉文献学统一术语并制定各文种的转写和翻译标准,少数民族文献研究将会有有一个较大的发展,也有望得到文献学界更多的关注,从而为传统的中国文献学打开一片新的天地。

关键词:古籍整理 民族古籍 国学 术语规范 行业标准

从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校录群书算起,中国文献学已经有了两千年的历史。如果把更早的孔子删《诗》也考虑进去,古籍整理的历史还要更长,可是遍检历代官修的《艺文志》《经籍志》乃至私家书目,里面只有零星的记录涉及少数民族语言,而且从存世的《华夷译语》和《五体清文鉴》之类“译语字书”估计,那不过是汉语与其他民族词语对照的教学用书,而通篇用少数民族文字写成的著作无一跻身朝野典藏。毋庸讳言,汉文化的发展和传播始终是中华文化史的主流,即使在少数民族当政的朝代,统治者也会主动迎合汉民族的文化传统并努力使之发扬光大,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历代学者轻视其他民族文化的狭隘心态。他们对汉文之外的图书缺乏兴趣,更没有人愿意费时费力去研读那些古怪的字符,这导致用少数民族文字写成的著作始终没有进入传统文献学的视野。

这种状况从20世纪初开始略有改观。敦煌乃至丝绸之路沿线的考古发现为人们带来了各种文字的原始文献,后来大都保存在欧洲的图书馆和博

物馆。那些收藏单位自然要动员专家从事整理编目,由此产生的初创研究引发中国学者的关注和参与。不过,早期的学者尽管看到其中有些资料可补史阙,但他们涉足这一领域的初衷多是“猎奇”而非全面探索那些民族的历史文化,加之多种古文字的识读刚刚起步,新兴学科缺乏足够的学术积累,所以工作做得粗略而不成系统。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做出两项决定,即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民族普查,以及在有条件的大专院校开设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这两项工作配合全国各图书馆的藏书整理,为少数民族文献知识的普及和发展创造了初步的条件——在少数民族地区调查时需要顺便了解当地的语言文字和历史文献,大专院校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需要相应的古文献充当教材。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少数民族文献研究已经初具规模,但也必须看到,这个领域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作为一个孤立的研究方向而存在,堆积如山的著作不能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甚至当今学者的论文都难得在综合性学术杂志上发表。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打破少数民族文献这个封闭的学术圈,使其真正融入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文献学?事实上就目前的情况看,通向这个理想目标的路程还很漫长。

无论怎么说,少数民族文化毕竟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不包括少数民族古籍^①的中国文献学是不完整的。不过也应看到,由于不同地区的社会文化发展水平不一,所以少数民族古籍的存世量和内容的丰富程度不及汉文古籍,从中几乎找不到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本民族思想特质,自然没有给后人留下如汉文献那样广阔的探讨空间。20世纪以前的文献以藏文、西夏文、回鹘文、蒙古文、傣文和满文书籍居多,可是里面除了一些为初学者编写的“杂字体”教材之外,大都是佛教著作的译本,即使是藏文的历史著作也往往带有浓厚的佛教色彩,像《仓央嘉措情歌》《松巴格言》那样的文学作品为数很少。另外还有大量抄本在我国西南部的彝族、纳西族、水族居住区流传,只不过当地从来没有出现过真正的少数民族王朝,缺乏政府主导的意识形态,所以这些文献记述的大都是本民族早年不成系统的巫术和占卜术,对民众思想和生活的直接反映明显不足,若打算像研究《易经》那样从中挖掘先民的“哲学观念”恐属徒劳。其中有些书的起源也许很古,但现在能看到的都是20世纪以后的民间复抄本,甚至是民间口述的当代记录,其作者和初创的大致时间都无从查考,甚至令读者难以断定那究竟属于古籍还是近现代作品,从而使其研究价值大为降低。

①这里说的“少数民族古籍”定义为:1911年以前用少数民族文字书写或刻印的具有书籍形态的作品,不具书籍形态的碑碣、未汇编成册的官私文书和当代记录整理的民间口头传唱不在此范围。这比当前少数民族古籍研究界的定义略窄。

在现阶段,如果期望少数民族文献得到中国文献学的普遍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研究能为整理和阐释传统汉文典籍提供多少帮助。站在中国文献学的立场上看,因为有各种版本的汉文“大藏经”传世,北方地区那些用各种少数民族文字翻译的佛经只是同样内容的转述,尽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译者那个时代的佛学水平,也有少量序跋能够提供些历史信息,但总体上可以置之不论。至于那些在南方地区封闭环境下形成的始祖传说和民间巫术,则从形式到内容都难能与汉文古籍形成互证,所以也没有多少文献学的意义,至多可以为民间文学和民族文化研究提供资料。当然必须看到,少数民族文献虽然有其先天不足的地方,这为古籍整理工作者的研究选题带来了不小的困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少数民族文献不能为传统文献学贡献新的知识。只要汉文献研究者和少数民族文献研究者有意识地互相学习,取长补短,那么在这一领域也并非全无可为。

二

在利用其他民族资料整理汉文古籍这方面,季羨林等老一辈专家合作编写的《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已经为我们做出榜样,但是大多数中国学者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仍然没有意识到这些资料的作用。当然,那些古怪的字符往往会让用惯了汉字的人望而却步,而事实上使用这些资料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困难——就西域的各种表音文字而言,研究者只要花费不多的时间,做到认识字母,理解字母的拼写规则,会查字典,勤于查找并利用前人已发布的研究成果,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因为汉文古书里零星用到的其他民族语词大都是不成句读的专有名词^①,所以并不一定要求研究者像老一辈专家那样系统掌握语法和词汇,且具有阅读原典的能力。真正考验研究者原典阅读能力的只有以少数民族译本形式保存的中原佚书。

不迟于魏晋时代,中原书籍就开始向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周书·高昌传》记载,当地“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

^①作为例外,刘向《说苑》卷十一《善说》载有一首“越人歌”,《后汉书》卷八六《西南夷传》载有白狼王的《远夷乐德歌诗》等三首诗,《晋书》卷九五《佛图澄传》载有“秀支替戾冈,仆谷劬秃当”两句完整的“羯语”。这几首作品均为汉字译音,是早期仅有的完整记录和翻译其他民族诗句的例子,但诸书转录用字不同。其原语形式至今不能复原,因此不能完成校勘。

之,而皆为胡语”^①。这表明最初的学校教学仅仅依靠教师即时的口译。不过可以想见,在这基础上很快就会出现写在纸上供更多人传抄阅读的译本。存世书籍中有一件最值得关注的事实,即见于历代官修书目的汉文原著有些已经亡佚,其内容全赖少数民族文字译本保存到今天。例如《宋史》著录有“吕惠卿《孝经传》一卷”^②、“孙昱《十二国史》十二卷”^③、“陈禾《孟子传》十四卷”^④,《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著录有“于立政《类林》十卷”^⑤,这四种书都未见传本,只有西夏文译本于20世纪初在黑水城遗址出土。由于讲述春秋战国故事的《十二国史》属于后世对秦汉古书的摘录,而《类林》则有金代王朋寿的增订本存世,所以参照前后时代的资料很容易复原汉文原本^⑥,从而为“史部”和“子部”各增添一种新书。相比之下,《孝经传》和《孟子传》的解读就困难一些^⑦,但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价值更大。如所周知,北宋“新经学派”的思想史料存世不多,而吕惠卿和陈禾的作品正可以为此补充素材。当然,研究者据其他民族译本构拟的汉文本不能保证与原书词句完全一致,但毕竟可以告诉我们原书的大致面貌和作者的价值取向。另外还有三部西夏文的兵书译本可供辑佚之用,即曹操、杜牧、李筌三家注《孙

①令狐德棻等:《周书》卷五〇,中华书局,1974年,第915页。

②脱脱等:《宋史》卷二〇二《艺文志》,中华书局,1977年,第5066页。

③脱脱等:《宋史》卷二〇三《艺文志》,第5097页。

④脱脱等:《宋史》卷二〇五《艺文志》,第5174页。

⑤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1564页。

⑥《十二国史》的首次刊布和研究见 К. Ю. Солонин, *Двенадцать царст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Центр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1995; 书题和作者鉴定见孙颖新:《〈十二国〉的西夏文译本》,《民族语文》2003年第6期,第13-21页。《类林》的首次刊布和研究见 К. Б. Кепинг, *Лес категорий, утраченная китайская лэйшу в тангутском переводе*,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3; 汉文复原本见史金波、黄振华、聂鸿音:《类林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49-326页。翻译参考王朋寿:《增广分门类林杂说》,《嘉业堂丛书》本,吴兴刘氏嘉业堂,1920年。

⑦文献的首次刊布和研究见 В. С. Колоколов, Е. И. Кычанов, *Китайская классика в тангутском переводе* (*Лунь Юй, Мэн Цзы, Сяо Цзин*),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66。草书稿本《孝经传》的首次楷书转写见 Eric Grinstead, *Analysis of the Tangut Script*, Lund: Studentlitteratur, 1972, pp. 277-376。《孟子传》的全文翻译和书题、作者鉴定见聂鸿音:《西夏本〈孟子传〉研究》,《国学研究》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35-648页。

子》、白文《六韬》和佚名注《三略》^①。这三个本子的内容多于传世本,具体文句也颇有差异,可以认为反映了北宋编定《武经七书》之前的古本面貌^②。除此之外,时代较晚的满蒙文献里也有一批传统古书的译本,尽管不能为中国典籍补充新的品种,但从译文中可以看出当时人对汉语原文多少有些独到的理解。

汉文古书里常见用汉字音译的其他民族人名、地名和职官名,辗转传抄的音译用字最容易出现鲁鱼亥豕的讹误。由于关涉其他民族语言,所以即使有他书的异文提示,当代点校者也大都不出校注,至多两存而不下断语。事实上如果能参考少数民族的资料记载,有些异文的正误是可以判断的。例如《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记载吐蕃始祖“改姓为罕勃野”^③,其全名在《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作“鹘提勃悉野”^④，“罕勃”(suət b'uat)与“勃悉”(b'uat sīēt)译音语序不同。如果注意到这个人名的藏文形式出现在公元815年的“赤德松赞墓碑”上,写作'o-lde spu-rgyal,其中spu对音合于“罕勃”,据此就可以判断《新唐书》的“勃悉”二字误倒^⑤。再如苏轼《仇池笔记》卷下记载宋军攻灵州未果而不得不撤兵,引得当地守军嘲笑说:“汉人兀捺否?”苏轼自注“捺一作擦”,“兀捺者,惭愧也”。考同一事又见胡寅《原乱赋》,译音字作“兀擦”。三个形体相近的异文何者为正,也可以借助少数民族语来做出判断——“惭愧”一词在西夏语作“𐽮𐽭”ḡuər tshja(脸热),在藏语作ngo-tsha(脸热,自惭),正与“兀擦”(ḡuət tshat)读音相合,由此可知“捺”“擦”均为“擦”字形讹^⑥。

①这三种书迄今只有三家注《孙子》得到了全文解读,见K. Б. Кепинг, *Сунь Цзы в тангутском переводе*,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79;林英津:《夏译〈孙子兵法〉研究》,“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28,“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4年;彭向前:《西夏文〈孙子兵法三注〉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六韬》和《三略》的原件照片见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1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90-221页。

②此类研究参看钟焄:《〈黄石公三略〉西夏译本正文的文献特征》,《民族研究》2005年第6期,第85-91页;邵鸿、张海涛:《西夏文〈六韬〉译本的文献价值》,《文献》2015年第6期,第32-38页。

③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5219页。

④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第6071页。

⑤Li Fang-kuei, South W. Coblin, *A Study of the Old Tibetan Inscriptions*,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1987, p. 198, p. 205.

⑥彭向前:《释“兀擦”》,《书品》2009年第6期,第83-84页。

事实上不但可以借助少数民族语言判断某些异文的正误,而且即使在没有异文提示的情况下也不妨利用相关资料提出问题。例如《宋史·夏国传上》记载西夏太宗德明“小字阿移”^①,据西夏文献可以猜想其中的“移”极有可能是“𪛗”字形讹。“𪛗”是西夏人惯用的译音字,专门对应汉语中没有的党项音节 zi。在西夏语和汉语音义对照的蒙书《番汉合时掌中珠》里,为西夏字注音的汉字一律用“𪛗”而不用“移”。在另一部汉文蒙书《杂字》的《番姓名》一章里,党项姓氏的汉译也是用“𪛗”而不用“移”,例如有“便𪛗”“讹𪛗”等^②。通过读音可以想到一个读若 zi 的西夏字“𪛗”,这个字的意思是“儿子”^③,则德明父母称他为“𪛗𪛗”a zji(阿儿)自是合情合理。

相比之下,《夏国传上》对夏景宗元昊名字的记述更加费解,甚至令人觉得那是完全不可靠的。那段文字说他“小字嵬理,国语谓惜为‘嵬’,富贵为‘理’”^④。与上述“移”字的情况相仿,西夏人也从来不用“理”为党项语注音。考“嵬理”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一作“崖理”^⑤,则《宋史》的“理”必是“埋”字形讹。“埋”字可用作党项人名译音,如西夏惠宗朝的国相叫“梁乙埋”。进一步可以从“嵬埋”联系到党项姓氏“嵬名”^⑥。《夏国传上》载元昊袭封之后“自号嵬名吾祖”,这里首见的“嵬名”被后代沿用为西夏皇族姓氏。“名”在当时西北方言的同音字有“铭”^⑦,见西夏天庆七年(1200)汉译的《观自在菩萨六字大明心咒》,全文作“唵麻祿鉢嚩铭(二合)吽”,音译梵

①脱脱等:《宋史》卷四八五,第13989页。

②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6,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38页。

③例见 Luc Kwanten, *The Timely Pearl: A 12th Century Tangut-Chinese Glossa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1982, p. 208。

④脱脱等:《宋史》卷四八五,第13992页。

⑤湖南图书馆编:《续资治通鉴长编(四库全书底本)》,中华书局,2016年,第6027页。

⑥“嵬名”在《元史》有多种异译,如“于弥”(卷一三四《李恒传》)、“吾密”(卷一四四《卜颜铁木儿传》)、“乌密”(卷一二〇《察罕传》)等。“嵬”字的中古声母 ɣ 在元明时代已经失落,所以可以译作零声母的“于”和“乌”。参看王静如:《西夏研究》第一辑,“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2年,第81页。

⑦“名”与“铭”在《广韵》中分属清青二韵,但在唐代的长安话里应该读音相同,如日译汉音“名”和“铭”都读 mei,参看[瑞典]高本汉著,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译:《中国音韵学研究》,商务印书馆,1940年,第633页、第636页脚注。

文 *om maṇi padme hūṃ*^①,其中“铭”对应 *me*,读音接近“迈”和“埋”。《夏国传上》接下来把“嵬理”解释为“惜富贵”,全然不可理喻,那显然不像是人的乳名,何况那不但不能与任何党项词语形成音义对应,而且这个词组的语序也是汉式而非党项式的^②。估计这个解释是中原人的附会,也许来自接下来所述元昊父亲德明告诫他不要跟北宋作对一事,原话是“吾族三十年衣锦绣,此宋恩也,不可负”^③,里面似乎带有些“惜富贵”的意思。若要进一步探索“嵬名”的寓意,则不妨借用训诂学“因声求义”的方法。“嵬名”在西夏文写作“𐵇𐵇”*ḡwe mji*,二者的字形里面都包含一个“𐵇”*ḡj*(圣)的成分,表明是专门为这个皇族姓氏设计的字。在西夏的字典中,“𐵇”*ḡwe*(嵬)的同音字有“𐵇”*ḡwe*(牛,乳牛),“𐵇”*mji*(名)的同音字有“𐵇”*mji*(喂,哺乳)^④,两个字组成的词组“牛喂”使人联想到《红史》(1346)一派藏文史书里记载的一则传闻。据后代一个名叫喜饶意希(*shes-rab ye-shes*)的党项禅师说,那个后来成为西夏王的婴儿曾被弃置到草丛深处,有一只鹰来张翅为他遮寒,有一头乳牛来给他喂奶,婴儿因此得名 *ngo nu*,意思是“牛哺乳”^⑤。显然,*ngo nu* 这个“小字”的意义恰好相当于“𐵇𐵇”*ḡwe mji*(牛喂),应该正是“嵬名”和“嵬理”的实际含义,只不过我们不能判定这传说是否受到了《诗经·大雅·生民》中“鸟覆翼之”和“牛羊腓字之”的影响。

明代的陈士元编写过一部《诸史夷语解义》,旨在搜集正史里的其他民族词语并用传统的训诂学方法加以校勘和解释,不过因为不通相关语言,所以书中讲得肤浅且谬误频出,完全不能服务于史书的阅读。事实上少数民族资料确实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古书里的一些疑难词语。例如《广雅·释木》有“道梓,松也”一条,当“松树”讲的“道梓”一词不见于他书,来历至今不明,所以王念孙仅注以“未详”^⑥。考虑到张揖《上广雅表》谓其详录“文同义异、音转失读、八方殊语、庶物易名不在《尔雅》者”,里面提到的“八方殊

①参看孙伯君:《普宁藏本〈密咒圆因往生集〉的八思巴字注音研究》,《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3期,第183页。

②按照党项语法,至少要说成“富贵惜”。

③脱脱等:《宋史》卷四八五,第13993页。

④李范文:《同音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21、215页。

⑤卢梅、聂鸿音:《藏文史籍中的木雅诸王考》,《民族研究》1996年第5期,第64-69页。

事实上藏语并没有 *ngo nu* 这个词,从读音上看,这个词反而很像汉语的“牛乳”。最早记载这个故事的《红史》(*Deb-ther dmar-po*)成书于1346年,那时距西夏覆亡已经过了一个多世纪,大多数党项后裔已经不会说本民族语言了,他们日常交流用的都是汉语。

⑥王念孙:《广雅疏证》卷十上,清嘉庆元年(1796)刻本,叶八十九。

语”使人想到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其实现在云南彝语支语言的“松树”一词仍然多有读如“道梓”的,如哈尼语碧卡话作 $tho^{31}tsɿ^{55}$, 傈僳语作 $tho^{31}dzɿ^{44}$, 纳西语作 $tho^{33}ndzəɿ^{31}$, 彝语墨江话作 $tho^{33}dzɛ^{21}$ 等等^①, 由此似可蠡测“道梓”一词的来源。

考证其他民族语言名词时,稍微困难的是必须了解所涉语言的音韵系统和语音拼读规则,不可仅满足于在当代研究者的方言中“听上去像”。例如《元史》卷一一四《后妃传》载元太祖皇后名“孛儿台旭真”,已知“孛儿台”在《元朝秘史》作“孛儿帖”(börite),旁注“妇人名”^②,而“旭真”一词此前只估计其义为“夫人”,但语音形式无法解释。实际上这是词语借用中的“音位替代”手段造成的结果——元代汉语大都话的“夫人”读若 $fuʒin$ ^③,而那时的蒙古语里恰好没有 f 和 $ʒ$ 这两个辅音,于是蒙古人就借用读音相近的 h [x] 和 j [$tʃ$] 来替代^④。另外,为了满足蒙古语“元音和谐律”的要求,还要用前元音 $ü$ [y] 替代汉语的后元音 u 以保持与 i 的发音部位一致。经过这几个音的替代之后,汉语的“夫人”一词被借到蒙古语里就变成了面目全非的 $hüjin$ [$xytʃin$]。词音变动太大使得汉人想不到它的真正语源,只好音译作“旭真”。这个汉语词后来又到了满语里,由于满语虽然没有 $ʒ$ 但是有 f , 所以汉语的“夫人”($fuʒin$)在满语里就变成了读音相近的 $fujin$ [$futʃin$], 音译“福晋”。

这就是说,只要方法运用得当,少数民族文献资料在汉文献的辑佚、校勘和注释诸方面都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至少能够启发学者深入思考一些问题,这绝对值得汉文献研究者重视。

三

汉文献学界是否愿意接纳少数民族文献,这主要取决于学者的观念。学者只要在主观上不排斥其他民族文献,平时多关注相关的研究成果,善于在自己研究领域的范围内加以选择利用就足够了。与此不同的是,少数民族文献研究若要汇入中国文献学,则要面对更多的困难。“观念”在今天已经不成问题,学者们都迫切希望得到中国文献学界的关注,但他们的具体研

①《藏缅语语音和词汇》编写组编:《藏缅语语音和词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549页。

②栗林均:《『元朝秘史』モンゴル語漢字音訳・傍訳漢語対照語彙》,东北大学東北アジア研究センター,2009年,第85页。

③大都话的声母表见杨耐思:《中原音韵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4页。

④把 fu 读成 hu 的情况在现代汉语方言里也多有存在。

究实践却给人以自我封闭的感觉。他们首先遇到的障碍是所用资料本身的缺陷。在汉文学界,只要发现并正确地鉴定一部前所未见的古书或者前所未见的版本,就可以认为是成绩,而少数民族文献,特别是南方的民间抄本,尽管大都是前所未见的“孤本”,但并不都有文献学研究价值。其原因是这些抄本大都没有记下作者的姓名,以及初创的时间、地点、创作主旨等,无法满足最基本的文献著录要求。此外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即在这些抄本的基础上产生的研究经常谈到家庭伦理和道德修养,研究者往往将其作为本民族的“特性”加以强调,却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中华民族的共性,即使在强调特性的时候也往往忽略了比邻民族间的文化关联。事实上如果不考虑服饰、语言之类表面现象,少数民族文献反映的诸多文化因素大都是各民族共有的,其中有些是周边民族文化与本土文化的融会,也有些是在人类共同心理基础上产生的契合,完全土生土长并具有向外界传播能力的精神产品为数极少。这就是说,那些专讲单一民族“原始信仰”的文献固然可以在综述性的目录专著里介绍,旨在展示该民族文献的全貌以扩大读者的视野,但若写成专题论文,则会让人觉得不能为中国文献学提供实质的帮助。

中国文献学经过长期的发展,到20世纪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话语体系,例如怎样设置著录项,怎样描述版本形制,怎样写校勘记和注释,以及怎样鉴定全书的价值等等^①。少数民族文献研究必须遵照这一话语体系展开叙述,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还有待于基础教育的加强。现在我国高等院校的少数民族古籍专业大都附属语言学科,目录、版本、校勘的基础训练比较薄弱,有的院校甚至没有把这三项内容纳入教学计划,只是一味地给学生教授一种或几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甚至表现出要以少数民族古籍研究取代中国文献学的趋向。事实上就目前的情况看,大多数学生学习少数民族语言是在硕士研究生阶段从零起步的,在短短两三年的时间内很难指望他们能熟练地使用这些语言。与其这样,还不如调整教学计划,引导学生把学习的重点放到国学传统上来,要求他们读几本规范的古书注释,读些文献学的入门著作,哪怕是《书目答问》《校雠通义》也好。至于少数民族语文,学生有基本的理解就行,因为他们在将来如果有机会从事古籍整理,面对的将是各种各样陌生的语言文字,在学校学习的那种语言本身不见得能派上多大用场,掌握古籍整理和研究的规范方法才是最重要的。

^①这套话语体系充分吸收了中国传统文献学的术语,例如作为宋元本典型装订形式的“蝴蝶装”在国外的中国学论文里一律被照字面译成了 butterfly binding,原来意译成 volume 的“卷”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直接音译成 *juan*。

四

成熟学科的标志之一是形成一套统一完备的术语体系。少数民族古籍研究仅有百年历史,其学术积累自然不能与汉文献学比肩,因此这一领域研究所用的术语乃至语言表述风格都应该尽量与传统的汉文献学一致,不要为了强调“本民族特色”而轻易使用民间的习惯说法,例如藏文和傣文经书的“梵夹装”不要说成“长条书”,刻本的“版框”不要说成“边线”,等等。这当然不难,难的是对不见于汉文古籍里的情况进行统一规定,即使不能做到全行业的统一,至少也应该做到特定文种内部的统一。这首先要做的事是规范拉丁转写符号和译音用字。

在国内外的现代东方学论著里,藏文字母“”可以转写成 *ha*、*ḥa*、*va*、*ʼa* 等不同的形式,回鹘字母“”可以转写成 *γ*、*q*、*x* 等不同的形式^①,这样会使不懂得原字母但又希望使用这些资料的学者感到无所适从。甚至可以看到,有的学者在论文中转引这类人名或者地名时,因为没有意识到有些看上去不同的符号不过是不同的研究者对同一个少数民族语言字母的不同转写,导致对着拉丁转写妄谈“音转”。毫无疑问,要使拉丁转写符号成为行业标准,那需要国内外的众多学者参与讨论。不过即使这样,形成共识也很困难,因为学者大都不愿放弃自己多年的用字习惯。

在翻译少数民族语言的专名词时,最理想的是把译音汉字和少数民族语音节间的对应关系固定下来。也就是说,同一个少数民族语音节无论出现在什么地方,都用同一个汉字来译,这样可以便于读者根据译音字理解词语的实际读法。在这方面的尝试始于清乾隆皇帝敕编的《同文韵统》,不过这部书规定的译音字过于追求贴近藏文的读音,甚至不惜用两个汉字甚至三个汉字来比况藏文的一个音节,结果导致这套标准异常繁琐,在日常的翻译中完全不能应用^②。就当前的少数民族古籍整理而言,音译北方民族包括藏族的专名词比较容易,因为有元明清三代汉文史书里的音译词可供参照,而音译彝、纳西等南方民族的专名词就比较困难,因为在汉文史书里很难找到对当的词语。现在的彝族、纳西族学者习惯根据自己的汉语口语来决定音译用字,可是他们所操汉语是受到少数民族语言影响的西南官话变体,其他方言地区的研究者无法据以还原词语的读音。为了让少数民族文献研究

①在现在国外东方学杂志里,藏文字母“”已经统一转写成“*a*”,而多数回鹘字母的转写因为涉及对原语音的构拟,所以至今不能统一。

②遵照这套规范编写的大型著作似乎只有和硕庄亲王允禄奉敕组织编写的《汉满蒙藏四体合璧大藏全咒》,使人感觉那套规范是专为翻译佛经设计的。

更好地服务于大众,当务之急是仿照《同文韵统》的总体思路,逐一设计某种语言或方言的标准译音字表。理想中的字表应该以“一字一音”为原则,同时适当照顾该民族的传统汉译用字习惯。译音汉字的选用应当尽量符合当前国家通用语(普通话)的规范读音,遇到通用语里没有的音节,比如带浊塞音或浊擦音声母的音节,则可参照汉语中古音(《切韵》音系)酌定。有些少数民族语言的声韵系统复杂,难以与通用语逐一对应,则可规定用形体不同的同音汉字分别表示,例如像《同文韵统》那样用“巴”和“拔”分别表示藏文的 *pa* 和 *ba*,用“答”和“达”分别表示藏文的 *ta* 和 *da*。当然必须承认,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工程,也许需要当地政府出面组织实施,因为没有本民族学者和汉语音韵学家、方言学家的充分合作是难以完成的,而且制定了标准以后的推行也不知能否得到本民族群众的支持。

总而言之,少数民族文献工作者应该时刻提醒自己,整理少数民族古籍的目标是为所有研究中华民族文化的学者提供可用的资料,而不仅仅是某个行业内部专家的智力游戏。只有向着这个目标做出努力,才能让少数民族文献研究真正融入中国文献学,最终为这个古老的学科打开一片崭新的天地。

【作者简介】聂鸿音,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西夏学、少数民族文献。